

八月政变

(原因与后果)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



八月政变

（原因与后果）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

苏群译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10号

М. С. Горбачев

Августовский путч (причины и 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сти", 1991г.

八月政变

(原因与后果)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 著

苏 群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75印张 插页2张 70,000字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1571-0/D·292 定价: 1.85元

(内部发行)

出版前言

戈尔巴乔夫的《八月政变》一书于1991年11月在莫斯科出版。据报道，它将以各种文版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人们对它感兴趣，是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我们翻译出版这本小册子，则是为了让我国的读者看一看这位曾权倾一时的苏联领导人在苏联剧变时想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再对照一下他实际上干了些什么，今天苏联辽阔国土上发生的是些什么。

此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戈氏回忆“8·19事件”三天期间他在克里米亚疗养地福罗斯的遭遇和感受。第二部分，是他重返莫斯科后一个多月里的作品，试图分析“8·19事件”的原因和后果，并阐述他认为什么是今后的出路。最后一部分，则是他在福罗斯期间写的文章，反思他所推行的“改革”“究竟是社会的需要，还是一个严重错误？”

戈氏在书中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归结为“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和“极权主义”而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

度加以否定，他宣扬“全人类价值观”的“新思维”和“改革”能把苏联引导到一个享受“民主”、“自由”、“人权”的“新时代”，他表白他早就决心加入“民主国家世界”，恳求西方在“粉碎叛乱”以后“消除对我国今后发展性质所持的一切疑虑”。他承认面对“联盟国家解体的现实威胁”，“人、思想和改革事业都已经成了一盘散沙”，苏联老百姓发愁的当前“主要问题是怎样熬到春天，怎样过冬”，希望西方“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改革输氧”。然而，在他出版此书后的短短两个多月里，苏联即告解体。这清楚地说明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的性质和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戈氏《八月政变》作为他的心态流露的历史记录，值得我们参考和研究。

我们在书后附录了莫斯科出版的《我们的俄罗斯》报1991年第23期刊登的一篇文章，瓦连尼科夫大将在狱中批点戈尔巴乔夫的《八月政变》，以供读者对比参考。

新华出版社

1991年12月

致 读 者

八月事件仍在受到我国和世界公众的格外关注。有人试图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过程和涵义、原因和后果进行认真的分析。遗憾的是，也有人另有打算，企图利用这次事件搞轻率的投机，以煽动低下的情感和不健康的情绪。不论这样做的人用意如何，这都会对社会团结和政治和谐的趋势造成损害，而国家目前迫切需要这一主要趋势。

当然，我也经常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我已公开说过一些看法。在过去几周的谈话中我又谈了许多。现在，我把这一切加以综合，想把自己的种种思考告知读者。进一步的分析、新的材料、事件进程本身，以及当然还有对叛国罪案件的侦讯，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和更有根据地了解全部情况和吸取教训。但是，我相信，我在本书中作出的评价和阐述的看法将不会被推翻。

米·戈尔巴乔夫

1991年9月

目 录

致读者

何来晴天霹雳?	1
福罗斯的三天三夜	6
叛乱分子的失败	17
叛乱的教训	25
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	32
人民代表大会	40
新联盟的轮廓	50
我们与外部世界	55
我认为,除了民主,别无他途	63
在福罗斯写成的文章	66
1991年8月19日医生的结论	95
戈尔巴乔夫1991年8月19日夜间在 福罗斯别墅的声明	96
附录:瓦连尼科夫大将在狱中批点戈尔巴乔夫的《八月 政变》	98

何来晴天霹雳？

暴力政变的话题及策划政变的传闻在社会上流传许多个月了。因此，政变的发生并不像晴天霹雳那样使人感到突然。我曾不止一次在回答这个直率的问题时说过：在目前情况下，政变是不可能发生的，政变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只有疯子才会这样干。但同时，我也绝没有低估这种危险性：右派在报刊和中央历次全会上的不断的歇斯底里狂叫，某些将军们的挑衅性言行，以及各级党和国家机构对许多改革决定的抵制。

在回顾8月19—21日事件的时候，我要说，深化改革的逻辑并没有排除事态的这种转折。我曾设想，发展会具有极其尖锐的形式。这种推测的论据呢？根本性的变革触动了整个社会机体和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

首先，我要说的是党，它曾经以人民的名义治理国家，但是却没有从人民那里得到这种权力。变革触及到军队，由

于实施新思维政策、进行裁军和采用防御学说，军队也卷入了深刻的改革之中。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转产已成为现实。转产进行得艰难，并带有许多消极的后果。要知道，在这个经济部门工作的人是社会上最有组织、智力最高和技能高超的部分，并且享有一定的特权。

还要加上改革进程引发的民族问题。再加上旨在改变劳动动机和转向市场经济的所有制改革。还有许许多多其他问题。全都同时出现了。

国家陷入了体制危机。由于社会发展逻辑本身的需要，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而在变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矛盾。旧体制被打破，造成了不稳定和混乱。在如此大的国家里进行改革也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几十年来，这个国家都处于极权统治状态，政权被垄断，国家所有制居于全面统治地位。改革的进程是令人痛苦的，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叛乱分子试图使国家回到极权制。但是，形势本身是由于政策和实际工作中的迟缓和不彻底而造成的，这尤其涉及到改革旧的权力机制。我指的是迟迟不消除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党的官僚结构，这种对权力的垄断和党的官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旧制度中保留下来。我指的是不必要的宽容，宽容不接受改革的人，他们依然忠于斯大林主义，忠于与其有关的一切，或者至少是信奉后斯大林主义。无论是在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在以后的历次中央全会上，拥护民主改革的人和千方百计抵制民主改革

的人之间都展开了折磨人的斗争。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地方党委委员会里。旧的体制已经被破坏，被分解，但是，它仍在尽其所能挣扎着，阻碍前进。

政变期间所发生的事，是反动势力同民主力量之间的决战，它应当以某种形式发生。这是对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的解脱。

现在有许多人说：难道戈尔巴乔夫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吗？当然，革新力量和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冲突，在理论上我是预见到了的。而且，不仅仅是我个人。但是，我从中得出过什么样的结论呢？

从社会的根本改造引起了危机过程时起，我就竭力设法防止矛盾的爆炸性结局，我也竭力设法通过策略步骤赢得时间使民主进程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排除旧的东西并在人民中巩固对新的价值观念的信赖。总之，我力求将国家引向一个能使任何这类冒险行动都注定会失败的时期。我的主要目标是，尽管有各种困难，也要保全改革方针，通过政治和立宪形式来保持进程，尽管这个进程存在弊病。

最近约一年半以来，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之间的对立加剧了。从去年12月，甚至从秋天起，这种对抗表现得十分激烈。而且双方甚至不掩饰各自的立场。不断有人呼吁采取非常措施，而中央全会也变成了真正的战场。1991年四月中央全会就是这样，它引起了社会的震荡。最近一次全会也是这样，在全会前夕，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72名州委书记中有32人发表声明说：必须叫戈尔巴乔夫作出回答。

我想起夏天在莫斯科同费利佩·冈萨雷斯的会谈。那时我就指出（而且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在我国社会，旧的社会政治结构同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本身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结构注定要崩溃，而且应当被取代。我的坚定不移的愿望是，不要流血，而是要通过民主方式做到这一点。但愿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在革命变革时期，这一次能避免流血。

而且，改革的发起者怎么会以别的方式行事呢？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还算什么民主主义者呢？如同在世界舞台上那样，我们恪守既定方针，排除用武力解决问题，防止发生反动政变。

9月11日，在同美国国务卿贝克会谈时我听到他说：“这几天，我同布什总统反复研究了您，总统先生的政策，现在我们理解您所采取的策略和折衷方针。您想赢得时间，不让保守势力有破坏改革方针的机会。”

是的，确实这样。为了在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消除紧张状态，采取折衷的方针是必要的。1990年9月和11月以及后来1991年春天就是这样做的，当时有人高呼口号：“打倒总书记！打倒总统”。而且，这种口号来自各个方面。必须确定行为方针以期创造条件来巩固改革，并使社会充满改革和具有保卫改革的力量。正是在这样尖锐的形势下，苏联总统和9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开会，发表了现在已众所周知并起过不可替代作用的联合声明。新奥加廖沃进程使社会再次懂得国内和谐的必要性。我再重复一下：我这些年来

的任务就是，维护和拯救改革的政治方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必须尽快签署联盟条约，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和改造党。

联盟条约草案本已准备就绪供签署。本打算8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由6个共和国的代表团签署联盟条约。我作为国家总统本应发表讲话。

我决定8月21日召开联邦委员会会议来讨论彻底进行改革的计划，以及食品、燃料和财政稳定等问题。

总之，将要在改革的各个主要方面进行深入而又坚决的民主性突破，要使改革转入新的水平，到那时：凡是不愿意或者不能摆脱行政命令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人，就没有容身之地了。阴谋分子看到，他们的时间消逝得很快。于是就恰恰选中这个时间来冒险。叛乱是对新奥加廖沃进程及其最重要的成果——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反应。

福罗斯的三天三夜

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叛乱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其策划者身居领导要职，在总统的左右。我个人感到最为沉痛的是背叛，这将使我终生难忘。

叛乱是从莫斯科开始的。显然，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

8月18日我在福罗斯别墅吃过午饭后，继续修改讲话稿，这个讲话应在联盟条约签字时发表。预定8月19日飞回莫斯科。前一天我曾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通话，谈了即将举行的条约签字仪式和联邦委员会会议的事。8月18日中午前后同亚纳耶夫通过话。他对我向他预告回到莫斯科的时间还表示了感谢，并说一定去迎接。随后，我又同米利奇科（副总理）、沃尔斯基（科学工业联盟）和古连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通过话。同杰缅捷伊没有通成话，因为他不在。我同总统助理沙赫纳扎罗夫通话讨论上面提到的讲话

稿时，已是16时30分了。众所周知，8月19日有人曾宣布我已没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职能。18日同我通过话的人中，只有两人出来驳斥阴谋分子说我有病的消息，而且不是马上，只是在一两天之后。

8月18日，16时50分，卫队长告诉我说来了几个人，要见我。我没有准备接待谁，也没有邀请任何人，更没有人向我报告说有人将前来见我。卫队长说，对此他也一无所知。“那您为什么要放他们进来呢？”“因为普列汉诺夫（国家安全保卫局局长）同他们一起来的，”他回答说。否则，卫队是不会放他们进来见总统的。有这样的规定，尽管生硬，但是必要。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弄清谁派他们来的。我身边有各种联络用的电话，无论是政府的、普通的、还是战略的和宇宙的。我此时正好在办公室，随手拿起一个电话，没有声音，拿起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都不通。我又拿起内线电话，它也被卡断了。而20分钟前，电话还是通的。看来阴谋分子早就想到和我谈不成，准备好了隔离方案。

我明白了，来的这帮人不是我平时接待的那种人。我先对妻子，后对女儿和女婿说，发生了意外。我十分清楚，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不排除使用讹诈、逮捕或者其他什么手段。总之，什么都可能发生。我对赖莎·乌克西莫夫娜、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说：“你们应当知道，我们不能屈服于任何讹诈，任何威胁和任何压力，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立场。”

不知道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不排除会对我的家庭成员采取最严厉行动的可能性。

全家都表示我应当作出这个决定，他们准备始终同我分担一切。我们的商量也就到此为止。

我打算去请他们进来，可是他们已经径自上楼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从来没有过如此无礼的举动。有博尔金（办公厅主任）、舍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巴克拉诺夫（我在国防委员会方面的副手、前苏共中央书记）。同他们一起来的第四个人是瓦连尼科夫大将，他同我很生疏，而且就是此人后来到乌克兰，向克拉夫丘克发出了最后通牒。普列汉诺夫也在，不过我让他留在办公室门口。

见面一开始我就问：“开始谈话前我要问，是谁派你们来的？”答：“是委员会。”

后来的谈话是：

“什么委员会？”

“就是因为国内形势紧急而成立的委员会。”

“是谁成立的？我没有成立，最高苏维埃没有成立。究竟是谁成立的？”

来者说，人们已经联合在一起，现在只等总统令了。给我指出两条路：或者下命令，并且留在这里；或者把全权交给副总统。巴克拉诺夫说叶利钦已被逮捕。后又改口，说将随时逮捕他。

“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

“国内形势就是这样。国家正在滑向灾难，应当采取措施

施，需要实行紧急状态，其他措施已经无济于事，再也不能抱有幻想了……”

等等，等等。

我的回答是，我对国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形势，对人们的处境、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遭受的种种苦难的了解并不比他们差。应当尽快采取能够改善生活的一切措施。但是我反对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问题，无论是出于政治考虑还是出于道德考虑，因为这总会造成成百、成千及成百万人的死亡。我们永远都不能这样做。否则，已经开创的一切就会被出卖和被埋葬，我们又会陷入新的血淋淋的恶性循环。如果你们有不同看法，你们可以在最高苏维埃提出来，交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寻求解决办法。总的说，我的立场他们是十分清楚的：我在最高苏维埃发表过声明，在中央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发动过进攻。我驳斥了他们的最后通牒。

最近几年我不止一次平息和防止了事态的危险发展。这一次也一样，我指望他们会明白过来并改变主意。所以我说：

“你们，还有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分子。你们会害了自己，不过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可以自便。但是你们会毁了国家，毁了我们已经做的一切。请把这些话转告派你们来的那个委员会。现在我们正准备签署条约。同共和国一起起草了关于食品、燃料和财政问题的重大决定，以便使政治和经济形势更快地稳定，使市场过程发展得更快，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在各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和谐已经出现，当

然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没有摆脱来自不同方面的怀疑。无论在共和国同中央的关系上，还是政治运动与社会活动的关系上，都存在着怀疑。但是唯一的途径，是寻求和谐。和谐已出现，我们已开始前进。只有自我毁灭者才会在现在提出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我决不同意这样做。”

这时，瓦连尼科夫说：

“您辞职吧。”

我驳斥了将军的这一无理要求：你们从我这儿什么也不会得到，请把这个意思转告派你们到这儿来的所有人。况且，我有机会会见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8月20日我们将签署联盟条约。决定8月21日召开联邦委员会会议，我们将讨论各种问题。我们将就内阁未曾达成协议的问题达成协议。应当作出决定，但不是采取你们想用的办法。

明天你们可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可是接下来怎么办呢？你们哪怕预先想一下，一天以后，迈出4步以后怎么办？全国都会反对，不会支持这些措施的。你们想利用困难，利用人民已经疲倦，以为他们会支持任何一个独裁者……

……顺便说一下，这几天我恰好同切尔尼亚耶夫同志一起推敲一篇大文章。这是一篇关于国内形势及其可能出现的几种发展方案的文章。其中一种就是实行紧急状态。它的主人公真的出现了。我在论述这种方案时指出，这是社会的毁灭，是死胡同，它会使国家倒退，会葬送现在已经拥有的一切……